



[德] 卡尔·洛维特 著 区立远 译

纳粹上台前后 我的生活回忆

Mein Leben in Deutschland vor und nach 1933

学林出版社



[德] 卡尔·洛维特 著 区立远 译

纳粹上台前后 我的生活回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纳粹上台前后我的生活回忆 / (德) 洛维特著; 区立远译.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08. 12

ISBN 978-7-80730-678-8

I. 纳… II. ①洛…②区… III. 洛维特, K. —回忆录
IV. K835.16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14916 号



纳粹上台前后我的生活回忆

作 者——[德] 卡尔·洛维特

译 者——区立远

特约编辑——陈佳鸣

责任编辑——马健荣

封面设计——张志全

出 版——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学林出版社(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3 楼)

电话: 64515005 传真: 64515005

发 行——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学林图书发行部(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1 楼)

电话: 64515012 传真: 64844088

照 排——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上海锦佳装璜印刷发展公司

开 本——890×1240 1/32

印 张——8.25

字 数——23 万

版 次——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6 000 册

书 号——ISBN 978-7-80730-678-8/K·42

定 价——22.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印刷厂调换。)

译者导言：关于洛维特与这本自传^{*}

卡尔·洛维特(德国)20世纪重要的哲学家,但他的名字无论在我国还是甚至在德国,都不算是家喻户晓的名字。虽然洛维特早在出版《从黑格尔到尼采:19世纪思想中的革命性断裂》(1941)^①与《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历史哲学的神学前提》(1949)^②等主要作品时,便奠定了作为历史哲学家与哲学史家的国际声誉,但是他思考的范围并不仅限于此,还包括哲学人类学、社会学、新教神学;而他把握问题与剖析手法之犀利、对西方思想传统的修养之深厚,更使他的哲学成果独树一帜,不容易用学院一般的哲学领域来适切标定。因此他的思想整体来说,仍有相当的部分与思索没有得到学界应有的反响^③。德国的麦兹勒(Metzler)出版社在他辞世之后,陆续为他出版了九大册的

^{*} 书中译者注释以①②③……标示次序,原注则以罗马数字[i][ii][iii]……标示次序。

① 德文原版 Von Hegel zu Nietzsche 于1941年问世,至1986年先后由几家著名出版社出版,一共印行了九版,此外并译成意大利文(1949,1969)、日文(1952/53)、英文(1964)、法文(1969),中文译本也于2006年由北京、香港三联书店出版,李秋零翻译。

② 第一版于1949年以英文发表:Meaning in History: The Theological Implications of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1953年出版德文版 Weltgeschichte und Heilsgeschehen. Die theologischen Voraussetzungen der Geschichtsphilosophie,而后并译为西班牙文(1956)、意大利文(1963)、荷兰文(1960)、日文(1964)。中文版则于1997年由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出版,李秋零、田薇翻译;2006年由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再版。

③ 关于洛维特的思想世界,本文无法作详实的铺陈。读者可参看洛维特自己的现身说法(见本书“生平经历”),这是洛维特1959年在海德堡科学院会上所做的演说,其中介绍了自己一生的思想进程。此外很值得一读的是刘小枫为《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与《从黑格尔到尼采》中译本所写的两篇导言,是笔者目前所见对洛维特的思想梗概最好的中文介绍。德文文献则相当丰富,Wiebrecht Ries, Karl Löwith (Stuttgart, 1990, S. 142-143)有一篇精选的书目,是不错的开端。

作品全集^①，其中包含专论十余本，加上所发表的各式文章接近三百篇，编选十分严谨，为仍在进行中的洛维特研究提供了健全的基础。现在翻译的这部自传，因为发现太晚而没有收入全集，但是在他所有作品当中，却可能是最适合通俗阅读、最容易让人认识他鲜明的思想性格的一部。

这本书的诞生与出版，背后有漫长而崎岖的历程。我们要从洛维特的生平经历说起。卡尔·洛维特 1897 年出生在一个富裕的犹太裔中产家庭，父亲威廉·洛维特(Wilhelm Löwith, 1861 - 1932)是一位白手起家的画家，也是慕尼黑与维也纳艺术学院的教授。他发迹的 19 世纪末年这段时期，可说是一段德国历史上的黄金岁月，经济、科技、学术、医药、现代化的基础建设如自来水、电力与电话的普及等，都在这二、三十年间有很大的进展，后来的史家以当时在位的皇帝威廉二世(Wilhelm II, 1888 - 1914)之名，称之为“威廉时代”。

由于 1871 年德国统一时，德皇威廉一世(威廉二世的祖父)将北德各州已经先行实施的公民平等法律一体适用于全国，于是从中世纪以来针对犹太人的种种歧视性的规定与职业限制皆不复存在，许多犹太家庭便把握住这个机会，从外地来到德国，从乡下涌入都市，在这黄金的二、三十年中艰苦奋斗，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像久旱的土地上下过了雨，千百的花朵拼命地绽放。此时犹太人占德国总人口约少于百分之一，但他们于此时期进入中产阶级的比例却远远高于德国人。有超过六成比例成为殷实的富裕阶级，而仍陷于贫困的犹太人则是族群中的少数。根据一项统计，在 1900 年前后，德国金融业高层的领导人里，犹太裔者约占三分之一强^②。其他如报业、出版业、工业，甚至学术等各领域

① Karl Löwith, Sämtliche Schriften (Stuttgart: J. B. Metzlersche Verlagsbuchhandlung, 1981 - 1988)。从各卷标题中读者可概略见到洛维特思想的范围：第一卷《人与人的世界：关于哲学人类学的讨论》(1981)；第二卷《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对历史哲学的批判》(1983)；第三卷《知识、信仰、怀疑：对宗教与神学的批判》(1985)；第四卷《从黑格尔到尼采》(1988)；第五卷《黑格尔与 19 世纪里哲学之扬弃/论韦伯》(1988)；第六卷《论尼采》(1987)；第七卷《论布克哈特》(1984)；第八卷《海德格尔：贫瘠时代的思想家》(1984)；第九卷《上帝、人、世界/论维科与瓦雷里》(1986)。

② Geo Epoche, 20, 犹太史专刊(2005)。

域,也都有远超过比例的犹太人进入顶尖的领导阶层。也因此这段时间里,德国的右派民族主义者仇犹反犹的声音日渐高扬,德文中的“反犹”(Antisemitismus)一词便于此时成型,而在一代人之后,更具体汇流成为迫害洛维特以及其他无数犹太人的力量。

在此世纪交接的时代,从富裕阶层的青少年当中兴起了一股“青少年运动”。简言之,这是中产阶层以上家庭的青少年主张要自我实现、自我教育,而不愿意顺从高度技术化了的社会对他们的种种要求。这运动因此便有一种反叛的性格。青少年运动的精神导师,正是尼采(1890年发疯,1900年过世)。洛维特青少年时深受青少年运动影响,在慕尼黑实科高中时代便已熟读了尼采的名著《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而且终其一生,尼采的“永恒轮回”的概念都是他批判传统历史哲学的重要元素。他自愿参加1914年爆发的欧战,主要的动机与其说是爱国主义——事实上洛维特的政治兴趣一直并不显著——毋宁说与青少年运动的关系更为密切,因为自愿从军正是年轻人的自我决定,也是对原本生活的逃脱与背叛。

在参战、负伤、两年的战俘生涯之后,洛维特于1918年返乡,进入慕尼黑大学就读,并在这一年的冬季学期听了也是犹太裔的韦伯(Max Weber, 1864-1920)著名的《学术作为一种志业》的演说^①,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影响,也为他的学问志向指明了方向。德国战败后德皇退位,慕尼黑正因苏维埃革命而混乱不明,洛维特决定遵循韦伯的教诲,将“当前的工作做好”,而这当前的工作,对他来说,就是哲学。

他于是转往弗莱堡(Freiburg)跟胡塞尔(Edmund Husserl, 1859—1938)读哲学,但更受到当时还默默无闻的胡塞尔的助教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的吸引。对这一段大学生活,洛维特在本书中有深刻的描述:

从外在条件来看,那是个困顿的时代,充满着危险、困厄与动

^① 中译参见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

荡,然而那同时也是一个最坦然开阔、最不受拘束、也最为独立的年代。在这段时间里,年轻人仍知道要找寻自己的道路,能各自成就自己的特殊性。人们从战场回来,对精神食粮充满渴望,而我们在大学里也真能够依照自己的判断找到这些食粮,大学的缺陷并不构成障碍。日后海德格尔有一次也跟我说,他再也没有遇到过同那时候一样的一群学生了。我们是最后一代的自由学生——不曾被集体价值统一烫平,也不以快速毕业为基本心态。

这样的大学经验非但难以用今日一般就业取向的标准来衡量,就连洛维特自己 1928 年之后在马堡(Marburg)任教时,也认为已经一去不复返。

夹在弗莱堡与马堡时期之间的重要插曲,是 1923 年的恶性通货膨胀。这场经济灾难沉重打击了自“威廉时代”以来的市民阶层,洛维特的父亲在短期内丧失了辛苦经营 40 年所积累的财富。洛维特在书中对魏玛共和这段时期(1918—1933)的政治局面虽然着墨甚少,但对这一场恶性通货膨胀却有深入的刻写,因为这一事件不只切身影响他的家庭,也被他视为当时盛行的文化虚无主义的对应物,更是欧战的真实意义的表现,同时预先为希特勒党人的上台作了准备:

它(战争)代表一种倾其所有的支付行为,一种全盘的毁灭,其结果就成了这段物价膨胀期间的一切归零,也是这千年的德国帝国的归零。德国中产市民的美德在当时被洪流冲走了,而这股污秽的洪流里夹带着的运动力量,在希特勒身边排成了战斗的队形。

1928 年洛维特完成就职论文,在马堡取得“编制外讲师”^①的身分。

① 编制外讲师(Privatdozent)是德国学术体制的特殊地位,凡完成就职论文者,等于在该学院取得“编制外讲师”的身分,有开演讲课的权利(venia legendi),但是还没有国家的聘书,还不是公务员,只能支领钟点费。这制度在今天的德国大学里仍然大致存在,主要在人文学科领域。

1929年与柏林女孩埃达(Ada)结婚,1931年得到固定的教职,自此他有可能会过平淡的哲学教授生活。然而从1933年希特勒登台后,犹太人的法律地位、工作与财产权益便开始岌岌可危。洛维特对于纳粹初掌权力时学院里的观望、被动、苟且、逢迎,以及学生的激进与肤浅,做了精彩的近身观察。整个大学体系毫无抵抗,怯懦地接受一体化运动,唯一在报上作了严正抨击的神学家巴特(Karl Barth),却是一个瑞士人。经历此段过程的德国学者,在战后愿意如实描述当时情况者并不多见。洛维特提供的,与其他许多速写段落一样,是一份珍贵的报道。

洛维特这本传记里描述最多的人,是海德格尔,这位引导他进入哲学世界,使他的学院生涯成为可能的导师,但随即也因时代政治、哲学路线与人格行事等等主客观因素而成为他猛烈抨击的对象。洛维特对海德格尔的批评并不是单纯地针对他为纳粹效力的行为,而是更深刻地指出海德格尔的政治投入,其原因是奠基在他的哲学思想里面。这不是“一时的失节”,而是如柏拉图三赴西西里一样,其政治行动是思想的自然结果。多年以后,洛维特经历了18年的流亡生涯回到海德堡任教,与海德格尔的关系也没有立刻恢复。海德格尔在战后顽强地拒绝对犹太人大屠杀的惨事公开发表立场,引起支持者与抨击者间激烈的讨论。洛维特于1953年出版了一本《贫瘠时代的思想家》(Denker in dürftiger Zeit, 1953),对海德格尔哲学给予严厉批判,而此书主要的线索,早在他1941年的这本自传里便已有清晰的呈现。由此可见洛维特思想的一贯性。^①洛维特在这本自传里不只批评了海德格尔,也对他人格与精神、行事与反应方式做了生动细致的写生。伽达默尔在给洛维特70岁祝寿的论文集里,曾赞誉他有可能是德国当代哲学家里文笔最优秀者,这论断在描写海德格尔的例子可以说得到有力的证明。

^① 洛维特自1938年起便与海德格尔停止联络。他与老师的紧张关系,直到1969年海德格尔80岁生日会上,才终于舒缓下来。洛维特出席了庆祝会,发表了一篇祝寿演讲(Zu Heideggers Seinsfrage: Die Natur des Menschen und die Welt der Natur. Zu Heideggers 80. Geburtstag. [1969],此文后来收在洛维特的演讲集 Aufsätze und Vorträge 1930-1970 [Stuttgart, 1971, S. 189-203]),开头处表达了对老师的哲学启发的感谢。

洛维特擅长用小故事或三言两语把一个人的神气模样精准抓出来,在这本自传中也是随处可见。

洛维特此书有许多主题发人深省,即便到今天也仍有时代意义。比如他对犹太文化与德国文化的认同问题的省思。犹太人在欧洲的散布很广,在纳粹实施系统迫害之前,从欧洲的最西边的西班牙到最东边的俄国都有。其中在东欧的犹太人,最概括地说,锡安主义比较强烈,对犹太信仰、犹太生活方式、希伯来文的学习与《托拉》(Torah)经典的研读都很重视。他们跟居住环境同化的程度小,所造成的冲突也大。但在西欧的犹太人,文化认同与解放的情形就比较普遍,其中洛维特的家庭即为典型的例子;他的父亲在文化上是个道地的德国人,完全没有犹太的信仰。洛维特对此有清楚的意识,他知道自己向来努力从犹太文化走出来,因此尽力排除自己身上仍有的犹太属性,也对犹太意识明显者感到格格不入。自传中他对于1933年被迫在“犹太人”与“德国人”两种身分之间选边站感到愤怒。犹太人的历史以“大离散”(diaspora)开始^①,极早便已成为欧洲文明的一部分;纳粹德国责难他们用伪装来败坏德国文明,是狭隘的血缘主义,而其实欧洲文明自始便容纳多种种族的影响,其核心从根本来说,并非基于血缘,而是一种批判的精神。^②事实上犹太人早已用他们的表现证明他们有能力“毫无保留地”进入欧洲文化;若排除犹太人的贡献,欧洲文明便是不可想像的;犹太人的经济

① 犹太人在公元70年与135年罗马人两波的迫害与镇压之下,族群的绝大多数就此离开了巴勒斯坦,毫无目标地散到世界各地,开始了所谓的“大离散”(diaspora)的历史。在基督教成为主流宗教之前,犹太人只受到政治经济的歧视。但在基督教兴起之后,犹太人在早期基督教神学家的论述中,成为上帝的弃民,而这样的歧视与偏见经过教父讲道与著述传播的影响(比如奥古斯丁[Augustinus, 354-430]),而成为反犹思想的主要理论基础。

② 洛维特在一篇写给日本读者的文章中说过:“欧洲精神根本来说是一个批判的精神,一种懂得分别、比较与决定的精神。虽然乍看之下,批判是某种全然否定性的东西,但是在批判之中,却含有一种正面的力量,能避免流传下来的与现存的事物陷入僵化,并能推动其继续发展。批判因此正是我们(欧洲人)进步的原因,任何现有的事物,都在批判中渐次地被打散、被往前推进。东方人无法忍受这种毫不容情的批判,不管这批判是针对自己还是指向他人。[……]这个囊括一切、质问、怀疑与研究一切的批判事物的力量,正是欧洲生活中的根本元素;没有这种力量,欧洲生活便不可想像。”(“后记:给日本读者”,《欧洲虚无主义》,收于《洛维特全集》第2册,538页。)洛维特此说虽有另外的脉络,但正好也是对纳粹德国取缔一切异见的一体化运动的绝好批评。

贡献与文化创造早已是欧洲文明中不可轻视的重要成分。然而被迫选择认同的犹太人，不是所有人都能看清事实。他们当中有人从未想过自己不是德国人，甚至还热切地支持希特勒，却一夕之间必须流亡国外；也有人“觉醒”自己属于犹太文化的“事实”，从此洗心革面，回归犹太信仰。在这道认同的光谱中，存在许多不同情状，也各有各的悲剧，这些都在洛维特的笔下得到或鲜明或简洁的刻划。

1934到1936年，因情势不明，洛维特靠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供的一份奖学金避居意大利，但名义上仍保留马堡大学讲师的身分。1935年初，教职被剥夺，他在德国的生存基础至此终于完全消失^①。1936年，意大利的法西斯政党也一体适用了德国的种族法令，犹太人必须在半年内全数离境。洛维特多方申请包括南美洲波哥大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教职，均未成功。眼看就要走投无路，这时却发生了奇迹一般的事情：昔日在马堡时期结识的、前来跟海德格尔学哲学的日本哲学家九鬼周造（此时任职京都大学哲学系）为他居中联络，帮他在日本仙台的东北帝国大学找到了讲座的位置。洛维特夫妇于是打点了行李，在1936年10月11日于意大利那不勒斯港登上了日本邮船“諏访丸”（Suwa Maru），前往遥远的日本。

洛维特在本书中跳过了33天的旅行日记，直接从到达日本之后的事继续说起。这段航海日记后来于2001年在德国出版^②，里面多是在船上对船客、各站风情、旅途的辛劳的叙述，虽然有他一贯的细腻与清楚的风格，但大多跟纯粹经验无甚关系，这或许是他跳过不录的原因。下面摘选相关的两小段作为补充。

① 这还是在通过纽伦堡法案（1935年9月）之前。按照这项法律，德国法律只保护具有德国血统的公民，这为往后一切歧视与迫害犹太人的法令提供了合法的基础。因此马堡大学当时的作法是“不合法”的，因为他当时还受到“前线条款”的保障（即：上过战场的犹太人不受1933年的“公务员保护法”的限制，可以继续任职），洛维特才会前去据理力争。

② 《旅行日记》（Von Rom nach Sendai. Von Japan nach Amerika. Reisetagebuch 1936 und 1941. Herausgegeben von Klaus Stichweh und Ulrich von Bülow, mit einem Essay von Adolf Muschg [Deutsche Schillergesellschaft Marbach, 2001]）。洛维特的遗稿是由位于马尔巴赫（Marbach）的德国席勒协会管理。

在他登船即将离开欧洲时，洛维特在自传里只简短地说了“告别意大利，我比离开家乡还难过”。《旅行日记》中则更完整地记下了他在此刻人生转折的感受：

当船离开那不勒斯的港口，异国的国歌响起时，因为被强制移民而产生的所有的悲苦之情，又再度向我袭来。如果不是因为绝大多数“善良无辜”的德国人都无可救药地相信了报纸、电台以及政治宣传，以至于他们对“移居国外者”只有一种印象，以为这些都是对德国充满怨毒、在外搞恐怖宣传以及一些不干净的分子，终身的所为完全只在于在外国伤害德国，被迫移民也不至于像现在这样伤人，这样使人沉重。可是实际上正是这些善良无辜的德国人，以一种只能用卑劣来形容的方式，对待着那些仍在国内生活着的、那些被迫移居国外的、甚至是那些在战争中为了德国而丧生的德国犹太人，而且对为数如此众多的受侵害者默默忍受的苦衷没有最丝毫的同情，更不愿去理解，只为了不希望他们“解决犹太人问题”的简单方案受到任何干扰。现在在德国，就算犹太人问题已被解决，但是“德国问题”并不因此就算完结；一个德国犹太人仍然远比一个日耳曼种的德国毛头小子更了解，什么才是真正的德国。（《旅行日记》）

此外，这艘“諏访丸”号从意大利出发，经过苏伊士运河、红海、印度洋、新加坡前往日本的航程，中间有一站是台湾。乘客除了少数英、美国人之外，其余大多都是日本人。洛维特夫妇上船不久，仙台大学便传来电报关心他们旅行的状况。船上日本人得知洛维特是受聘到日本任教的哲学教授之后，顿时对他们十分尊敬。因此邮船离开香港，抵达基隆，也就是首度进入日本占领区时，日本人特别安排了洛维特夫妇与其他几位西方人做了台湾一日游。日记上有这样的记载：

本的领土。港区有防御工事，离船的检查十分严格。有船坞，有工厂，一切看起来都很破败，好像还没盖完一样，尽管福尔摩沙在日中战争之后已经落入日本人手里40年之久。这个港口名为基隆(Kirun)，一片的脏乱可怜；几位日本先生安排了一辆汽车带我们前往台北(Taihoku)参观。所走的公路路况恶劣，让汽车爆了几次胎。同行的英国人对于已经经营了40年的文明设施却仍然如此凄惨感到惊讶，也有道理感到惊讶，但是日本的先生们仍然很骄傲他们在这里所做出的成绩，因为从前这里尚住着出名的猎头头族，而猎头者是当地的原住民，被猎头的人则是外来者！现在这些原住民只得改用微薄一些的礼物献给神明了。中国的居民现在有了学校，必须学习阅读与书写。仍未完成的公路两边立着可怜而肮脏的砖造房屋，里面住着穷人，看上去让人觉得，他们新的统治者手下过得实在不怎么好。但是这块土地非常肥沃；谷地的平原上大量地种植着稻米、茶、香蕉、樟脑，高耸的山景看上去十分壮观，日本人说，上面有些地方仍是原始状态。到了台北，总督的驻地，日人在此处设立了一间银行，一家邮局，几所学校、公园，甚至还有一所“大学”^①，但是这些都不引人久留观赏。最漂亮的，是一座古老的中国城门^②。也因此当我们去附近一座寺庙（神道教的神社）参观时^③，令我倍感出乎意料。这是一座新建的、但是按照极为古老的传统建成的设施，让我第一次对于异教的寺庙有了一点概念，也第一次认识到什么叫做与自然的力量相和谐的“神圣树林”。（《旅行日记》）

日记中接着是洛维特对台湾神社详细的描述，以及在这印象下所作的一些省思，颇有一些篇幅，此处无法全部录写，但对于这座台湾神

① 显然是台北帝国大学，台湾大学的前身。台北帝大创设于1928年，此时只成立8年。

② 推测是小南门。

③ 台湾神社，日本人在台湾最重要的神社，位于剑潭，1944年毁于一场飞机失事意外。原址现在是圆山大饭店。

社的研究而言,是一份有意思的史料。由于历史的偶然,洛维特可能是西方重要哲学家中,唯一到过台湾的人。

洛维特在日本任教的时间是 1936 到 1941 年,这段难得的东方经历,给了他许多近身观察东方文明以及回头省视与比较欧洲文化精神的机会。《洛维特全集》第二册里收录了他一些与日本相关的思索,如《欧洲虚无主义》(1940)文末的“后记:给日本读者”,对于日本吸收西方文明的方式提出了他的批评;《关于东方与西方之差异的几个注记》(1960)总结了他对东西方精神的根本比较与掌握,分析极其深刻,可与本书中对德国文化精神的分析、对意大利人民族性的深入观察互相参照。

以上所述主要是提供一些整理的资讯与背景,以帮助对作者与此书的理解。事实上洛维特此书或许不需要太多的介绍,当中许多事,他自己已经做了最好的说明。最后回到这本自传的出版故事:这本书原本是作者在日本流亡的最后一段日子里(1941 年 1 月),为了参加征文活动争取奖金、贴补移居美国所需的旅费,而在短时间内从自己的日记与搜集的书信、文件里整理写出来的自传文字。然而这份自传性的报告显然太过哲学性,不合哈佛大学征文单位的需求,因此没有得奖。事后洛维特也无意出版。此后这份文稿便跟着洛维特夫妇的行李,从日本到美国(1941 年 3 月),辗转多处。战后,1952 年,经昔日同窗伽达默尔的接洽,洛维特重返德国,在海德堡大学哲学系任教,1964 年退休,1973 年过世,这份稿子已经无人想起,直到遗孀埃达整理稿件时才被重新发现,到 1986 年才终于出版。像时间种子一样沉寂如此之久,却在条件完全改变了的时代重新问世,也算是难得的奇书。书中所描述的人、事物与角度,不是后人搜集资料便可代写,甚至也不是原作者事过境迁之后所可能重写。“前言”作者克泽勒克提到,哈佛征文事件如今无人知晓,稿件也不知去处。不过随着“流亡文学”研究的兴起,德国美因茨(Mainz)大学教授盖尔兹(Detlev Garz)于 1994 年在哈佛大学的档案馆里重新发现了这批应征稿件,所以现在知道当初共有 270 份报告参加应征,文章长度介于 120 页到 300 页的打字稿之间。当中也有些精

彩的报告现在已经出版。^①

Prof. Ernst A. Schmidt 先生在本书翻译过程中曾经提供译者协助,解释许多困难的地方,在此表示感谢。他 60 年代在海德堡读书时曾经上过洛维特的课,也认识洛维特夫人。据他转述,洛维特讲课都是把整篇演讲完全写出,上课时则一句一句地宣讲,语调相当单调,课堂上学生并不特别多。当时的海德堡哲学系里,是伽达默尔比较热门。洛维特夫妇没有子嗣,也并不富有,晚年在海德堡过着很简单的生活。

本书根据德国 J. B. Metzler 出版社 1986 年版单行本译出。

区立远

① 见 John M. Spalek/Konrad Feilchenfeldt/Sandra H. Hawrylchak (Hrsg.): Deutschsprachige Exilliteratur seit 1933 Bd. 3: USA, Teil 1 (Bern/München: K. G. Saur Verlag, 2000)。另可参考哈佛大学怀顿图书馆对该档案的网页介绍,见 <http://oasis.harvard.edu:10080/oasis/deliver/~hou01275>,以及当年为介绍这个档案所出版的介绍手册: Harry Liebersohn and Dorothee Schneider, "My Life in Germany Before and After January 30, 1933": A Guide to a Manuscript Collection at Houghton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2001.

编者前言^①

卡尔·洛维特(Karl Löwith)之所以在1940年写下这篇生活的记录,是一个外在因素引起的——当时的哈佛大学举办了一个有奖征文的活动,目的是要搜集德国1933年前后,第一手见证者的经历报告。该征文活动当时过程如何、参加的诸多稿件后来归于何方,如今已完全不可考。^②不管怎样,洛维特并没有得奖,而这一点也不令人惊讶——因为这项征文活动期望收到的,本来就不是这种“对往事所作的哲学思索”^③。总之,尽管洛维特所写的既不算是一部哲学自传,也未在一般性的文化批判与观察上深入着墨,但这篇记录仍自然地流露他个人独具的风格——这是一位读过生物学学位的哲学家风格,他观察入微眼光的冷静与精准,紧密地结合了现象学描述的直接与清晰。

因此这不是一部事过境迁的往事追忆录——往事追忆录采取的是今日的眼光,而且寻求从往事中挽救一些还可挽留,甚或已不能挽留的东西。相反地,这是一份流亡日本时期所写下的中途报告,这是站定下来喘一口气、仍带着甫遭重创的痕迹——洛维特正是凭借着自己不屈不挠的思想韧性,帮助自己从这打击中超脱出来。这份文件充满戏剧的张力,当中并非每字每句都饶富艺术构思,而是带着日记般随兴的风格,不断地转换题材,重新开始。这份文献征引了许多书信,也附上一些与国社党^④

① 本文作者克泽勒克(Reinhart Koselleck, 1923-2006)为德国当代著名史学家。早年在海德堡求学,对其之描述可参见[德]尼古劳斯·桑巴特,《海德堡岁月》“三位朋友”一章,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5月版。

② 现在这批稿件已有研究者发现。请参见“译者导言”。

③ 有奖征文的广告有这样的规定,“征文广告”见第187页。

④ 即一般所称的纳粹党。

的独裁统治相关的印刷资料。洛维特带着警觉的好奇心与压抑着的愤怒,以及对国社党逐渐转强的鄙视心情,搜集了这些资料。洛维特的亲身经历在这份文献里处处都留下了鲜明的痕迹,这也就是此书具有无以复加的现场感的原因。

本书的章节有时按照时间顺序,有时又按照不同题材来区分,这说明了此书的两种切入方式,也描绘了两个不同的层面:一方面,洛维特以1933年的巨变当作叙事聚焦的核心,报导了他在之前与之后的亲身经历;另一方面,他也深入思索这些经历、思索当前的历史发展带给他的挑战,而这些挑战改变了他的人生,并强迫他作出回应。

表面上这本传记的开头很寻常,从一位热衷青少年运动^①的年轻人开始讲起。洛维特出身于一个富裕中产阶级的艺术家家庭,父亲是一个已脱离犹太教信仰的犹太人,祖籍麦伦^②。他在慕尼黑以画家身分取得了一个颇受敬仰的地位;他的祖国认同是德国,并以慕尼黑为家乡。传记接下来写洛维特的自愿从军,写他在埃普(Epp)的骑兵部队中经历的前线战,写他在意大利遭受重伤与战俘生涯,以及回到慕尼黑后与韦伯的接触,还有跟随胡塞尔与海德格尔读书、在马堡完成就职资格(Habilitation)、当上讲师后的成功表现等等,一路写到1933年。到这里,我们读到的是一段相当成功的经历——尽管就当时的知识中产阶级来说,这样的经历是相当典型的。

1933年洛维特因犹太人的身分而被剥夺公民权利。这事并不太令人惊讶,但是这切断了维系个人生存基础的一切。他一次世界大战的从军经历,使他比别人更晚才被剥夺公民权利,然而这只是表面上的肯定,实际上却是更大的羞辱——因为这仿佛是说,为祖国上前线的经历跟一个学历没有两样,而因为洛维特是犹太人,所以这经历也可被撤

① 青少年运动(Jugendbewegung)是德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兴起的一个影响深远的运动,支流派别众多,是此时期广泛的文化、社会批判潮流的一个环节,参加的年轻人多像洛维特一样出自中产家庭,参加者结成社团、旅行漫游,主张年轻人有自我决定、自我教育的权利,该运动颇受尼采的作品影响。德国现在的青少年政策、青少年组织与青少年社会工作等都留有这个青少年运动的影响。

② 麦伦(Mähren)位于今日捷克境内,当时属奥地利。

消。从1933年起,洛维特被迫做出他本来根本不需要作的选择:他得当一个犹太人、得放弃他的教职、得避居意大利——并且身分不是移民,而是一名流亡者。洛克菲勒奖学金结束之后,洛维特在世界上纳粹势力以外的地区找寻职位。最后,就在意大利通过种族法律、犹太人即将再度被驱逐之前,他及时移居到日本仙台市——他的几个日本学生与朋友不顾德国官员的抗议,在那儿为他找到了一个教授职位。本书的叙述结束在最后的逃亡——前往美国之前,而这次的逃亡时间也相当紧迫,因为珍珠港事变就发生在洛维特与妻子到达美国后不久。

对一个具有沉思性格的人来说,这种外在的颠沛流离与遭受迫害,已是十足的磨难,足以召唤与抓住读者。然而真正触动读者的,却是洛维特对种种遭遇随处记下的许多思考。我们无法对这些感想作总结的叙述,因为这些感想是产生于许多独特而无法再现的情境中——也紧密地扣合在那些情境里。

传记中的各个阶段,大多鲜明地记叙了洛维特所遭遇、共事——甚至必须与之争论交涉的各式人物。洛维特对于用文字描写人物十分精擅,这些描写不只描绘心理与相貌,也穿插着种种小故事与紧扣情境的对话,还附上简短到几乎不能再短的品评文字。洛维特所用的是一种罗马史家塔西陀^①式的笔调,而书中有描绘其性格的人物,这里只提四个比较典型的例子——韦伯、施魏策尔^②、布尔特曼^③与施密特^④,都不是洛维特偶然遇到的人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洛维特日后出版的《贫瘠时代的思想家》一书中对海德格尔的批判,在本书的自传叙述中也已

① 塔西陀(Publius Cornelius Tacitus, 55-115),罗马帝王时代著名的史学家,有《历史》、《编年史》两书传世,塔西陀的拉丁散文以练字精省却涵意幽深著称。

② 施魏策尔(Albert Schweitzer, 1875-1965),著名德国神学家、医生、音乐家与人道主义者,38岁时于加蓬(Gabun,位于非洲中西部)设立热带医院,于该地服务至90岁逝世为止。1952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③ 布尔特曼(Rudolf Karl Bultmann, 1884-1976),马堡著名的新教神学家。其成名学说“去神话化”(Ent-mythologisierung)深受海德格尔影响,主张去掉神话的外衣与成分,从而从存在观点来考察新约圣经中人的存在。

④ 施密特(Carl Schmitt, 1888-1985),德国著名法政学家,批判魏玛共和,提倡强大集权的国家型态,纳粹时代曾积极参政。其著作至今仍有影响力,主要著作有《政治的概念》(1927)、《政治浪漫派》(1919、1924)等。